

28
光泽文史资料

13.07
10
+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光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光 泽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光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乌君山远景



红军曾住过的山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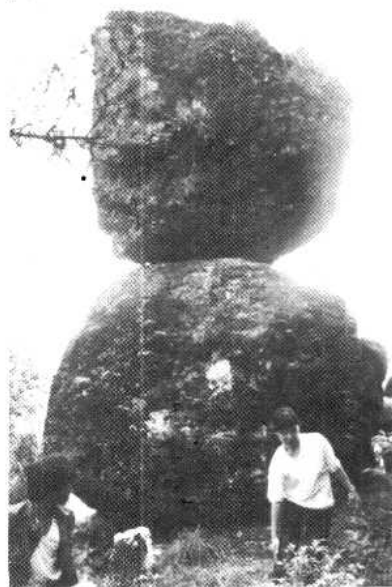
本辑照片均由郑京士同志供稿



猴面岩



仙女池



风动石



神龟下山



巨蟒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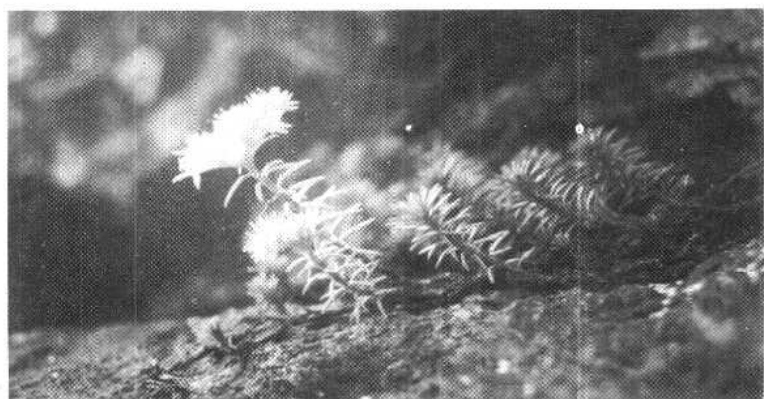
蛤蟆石



四季相思花



峭壁玉兰



龙牙齿草

目 录

何秋涛与中俄关系史的研究·····	孙海泉 (1)
发展中的二轻工业·····	何树声 (12)
档案工作为社会经济服务·····	傅德文 (18)
农家宝——红花草·····	陈仕良 (22)
水轮泵发展概况·····	郑道亨 (25)
解放前的国民党县参议会·····	黄溥松 (29)
民国时期的光泽县警察局·····	陈 超 (33)
解放前光泽民间的帮会组织·····	万述玘 元书贤 (36)
四十年代发生在光泽的两起谋杀案·····	郑邦宁 张宗岳 (40)
民国时期光泽的赌害·····	黄茂发 (43)
光泽建县时间的商榷·····	刘福成 (47)
司前乡民姓氏溯源·····	洪景新 (50)
乌君山史话·····	郑邦宁 黄茂发 (56)
九墩山麓的变迁·····	何树滋 (73)
镇岭浮桥话沧桑·····	黄衍源 徐钦麟 (75)
“九关十三隘”简介·····	周道维 (77)
“杯玻璃”名小议·····	黄茂发 (82)
光泽古驿站及驿铺·····	周道维 (83)
光泽城内古巷存废考·····	黄溥松 (85)
绣草庐·····	高云呈 (88)
李氏七贤·····	刘福成 (90)
“三龔”轶事·····	江占元 (95)

漫谈龙舟竞渡·····	何树滋(101)
马年话马灯舞·····	林家骅(104)
光泽的丧葬旧习·····	何树滋(106)
山乡处处有珍奇	
相思鸟 蜂鸟 四脚泥鳅	
庭辽梨 鹿啣草 金樱子·····	上官绍诒等(109)
1989年光泽县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一天·····	(113)

何秋涛与中俄关系史的研究

孙海泉

一、何秋涛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朔方备乘》的编撰

何秋涛（1824—1862年），字愿船，福建省光泽县福民坊人，出身于封建小官僚家庭。由于家庭的因缘，他从小接受严格的教育，博览卷册，对于地理学尤感兴趣。184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从此，他更广交良友，遍览群书，使自己的学业大进，同时他又旅游名胜，搜集史地资料。广泛的交游使他进一步接触了社会，丰富了阅历，开阔了眼界，这是他一生学有所成的重要原因。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起义时，何秋涛随侍郎李嘉端坐镇安徽。1853年春（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克了武汉，不久顺江东下，破九江、克安庆，所向披靡，李嘉端为此被免职。何秋涛亦因此引咎辞职，返回京师。经此打击，何秋涛不再热衷于宦海的升迁，独潜心于学术之研究，“专精汉学”，“于经史小学，靡不研究，而尤长于舆地”，并力求“考证钩析，务穷其源委，较其异同”。

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机阻不安的社会、腐败的政治，何秋涛作为“通达时务，晓畅戎机”的一份子，以其一技之长即研究边疆史地来向清王朝提供借鉴，初编成六卷本《北徼汇编》，后来他对此书又加以增补，成八十卷本，尚书陈

孚恩为之作序,并呈御览,咸丰大喜,晓谕何秋涛再次修改,并惠赐书名《朔方备乘》。何氏亦因此书而被咸丰帝召见,晋升为员外懋勤殿行走。

《朔方备乘》是何秋涛的代表作,成书于咸丰初年,“凡所纪述至道光季年而止,事阅三朝,年逾一世”。全书八十卷,卷首十二卷录自“圣训”、“圣藻”及钦定《平定罗刹方略》、《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材料。其余六十八卷,分为圣武述略六、考二十四、传六、纪事始末二、记二、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书五、表上及图说一卷,乃取材于历代正史、中外舆图及稗官外纪等。综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部将官私著述中有关北部边疆的史料进行分类排比和考订而编成的资料汇编。其书不局限于蒙古及西南地理,而是以北徼与俄罗斯关联者为范围,并叙及东北边疆,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及中亚东欧之地,亦俱有考证,对汉、唐、辽、金、元历代北徼用兵,清初中俄交涉,都有记述,但书中最有价值者乃有关中俄关系的篇章。当时沙俄为我北方最大的敌人,中俄边界延袤万里,犬牙相错,沙俄的侵略政策时刻威胁着我国,故《朔方备乘》一书以很大的篇幅研究了唐宋以来的东北边疆,并对中俄山界、水界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考证,“先绘成俄国全图及中俄分界图,与是书相辅而行,俾览者有所考焉”,着重记载了自康熙年间两国定界议和后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对《朔方备乘》一书的研究可以看出,何秋涛的治学目的是通过对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反映边疆史地的沿革,以资借鉴。在其书“凡例”中,何秋涛自称“是书备用之处有

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由此可见，何秋涛借此书以颂清初盛世武功，告诫清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效法先王，谨记“勤政爱民”的圣训，认清边疆对于内地安宁的重要意义。特别现时欲抵御外侮，巩固边疆，就必须集夷务，一是了解外夷情形，做到心中有数，只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再是学习外夷之长，收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效果。他说“昔夷务之兴，中国患不知远人情伪，今之所记，安知不收。一壶千金之用是在筹边者加之意而已”，可见，他的学术思想属于“经世之学”的范畴，提倡学问“要归诸实用”，所以李鸿章亦不得不称赞何秋涛为“究心时务”之人。

当然，何秋涛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在《朔方备乘》成书之前，早已有两部震动士林的地理书闻世了，有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林、魏两书对何秋涛影响甚大，其一是两书所倡“经世”之学风对何氏有影响；其二是进一步促使何氏从事史地学的研究。而两书的边疆研究未涉及东北地区，何秋涛说：“自古言形势者于朔漠多未详备，盖驻域狭，故记载略也”，他又“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故何氏欲填补这一空白。不难看出，何秋涛研究边疆史地学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提倡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相继签订，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夺，使清最高统治者咸丰帝想到了《朔方备乘》一书，于

1860年，索取该书副本，侍郎黄余汉欲将书稿誊写后呈上。不料黄宅失火，使得书稿百不存一，何秋涛为之甚是懊丧。由于长年弃官从文，薪水低廉，故生活甚是艰难，有时连基本生活亦不济，然而他却“讲诵不倦”。为此，其好友黄彭年推荐他到河北保定莲池书院讲学。从此，何秋涛讲学于莲池书院，直至1862年6月30日病死，享年39岁。他的门人监生沈丙墀买地，把他葬于保定西郭外马池村，好友杨宝臣育其二子，黄彭年等因感其“博学能文，深知远虑，而穷困以终”，为之撰写墓志，聊作纪念。

二、《朔方备乘》与中俄关系

《朔方备乘》中关于中俄关系篇章较多，主要篇章有《北徼界碑考》、《艮维窝集考》、《艮维诸水考》、《库叶附近诸岛考》、《俄罗斯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等，具体记载了清初沙俄向我东北边境扩张和中国政府反侵略斗争以及中俄两国人民早期友好交往的历史情况，颇有历史价值。

（一）沙俄对我北方领土的侵夺

俄国由莫斯科公国发展而来，俄国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说：“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向国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早在伊凡四世时，就开始了“向东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首先，俄国占领了西伯利亚，继之则开始染指我黑龙江流域，覬覦我神州大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说：“时（顺始至康熙年间），其国（俄罗斯国）所属罗刹滋扰黑龙江境，出没于尼布楚、雅克萨渚地，屡经大兵剿抚而盘踞如故。”1643—1645年、1650年、和1653年沙俄政府派遣所谓“远征军”三次入侵我黑龙江流域和沿岸

地区,都在中国人民的抗击下,以可耻失败而告终。然而沙俄败不甘心,于1688年唆使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反祖叛国,企图“夺取黄河为马槽”,破坏国家统一的同时,又出兵侵占我东北地区,占雅克萨城。在国内“三藩”叛乱平定后的第二年(1682年)“圣祖以俄罗斯频年肆虐屡行,晓谕令撤还其众,归我遁逃各居疆土”,并且“数次遣人往谕,亦于来使处屡有文移”,但“总无一次回报”,清政府出于无奈,决定用武力解决边疆争端,先后于1683年和1685年、1686年三次出兵雅克萨,并击毙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此时,在清军的打击下,沙俄侵略军才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和谈建议。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内大臣索额图等赴尼布楚议定疆界,立约曰和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疆。对于《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原因,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这样分析的:“俄罗斯兵守雅克萨、尼布楚二城者,每城兵仅数百,我黑龙江兵数千攻之,何难一举摧拉,而圣祖两致书察罕,一寄书荷兰,往返数万里,始定疆界何哉?其时喀尔喀准噶尔未臣服,皆与俄罗斯接壤,苟狼狽犄角,且将合从以挠我兵力”,为防止中外背叛势力进一步勾结,确保国内和平之良苦用心,康熙皇帝才不惜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换取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通过对近代中俄关系的研究,何秋涛认为,鸦片战争时,“俄罗斯诸国皆治兵为备”,对中国虎视眈眈。一旦有了机会,沙俄便会重点战火。有鉴于此,何秋涛得出结论,应对俄国有所防备。为了提醒清王朝注意中俄边疆,他细心考证了中俄边疆,“中国与俄罗斯以水分界有三:曰额尔古纳河、曰格尔必齐河、曰楚库河”,并具体考证了河流两岸土

地之归属。他说：“额尔古纳河为中国与俄罗斯分界之水，康熙二十八年分界石碑云：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俄罗斯）”；考证格尔必齐河时记载道：“康熙二十八年分界石碑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北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俄罗斯”。何氏的目的无非是劝告清统治者知道边疆之所至，注意国境之动向，切不可丢失一寸土地。

为了促使清政府汲取历史教训，他特地考证了尼布楚和雅克萨二城的历史。指出，尼布楚，“本中国蒙古属地，初非罗刹所有，亦非甌脱之区也，”只是为了让俄国有“贸易栖托之所”和保证边疆安宁《尼布楚条约》才让与俄国的。至于雅克萨城，“中国隶籍在前，罗刹兵争在后”，显然，雅克萨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其后，雅克萨城一直为我领土，到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才为俄国割占。

与此同时，他又向清政府提出了防范俄罗斯的建议，“我朝东北境接壤俄罗斯，自雅克萨城以东未设卡伦，当以弱水为天然重险”，这里所谓弱水是指沼泽地带，落叶数尺，加上天气寒冷，所下雨水不易流动，人不得入，“入者必陷，疑于不能载物，故古称弱水，非别有一水谓之弱水也”。在主张加强边防军事的同时，他还主张充分发挥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加强与边疆各族团结，其主要的办法就是“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齐其宜”，驭外夷必因其习尚

以决人心之去就”，把决定人心之去就看作是御侮的一条有效途径。

土尔户特部原是额鲁特蒙古的一支，居住在蒙古草原北，“北界俄罗斯，南界哈萨克，东界哈喇哈尔榜，西界图里雅斯科，处于四国之间”，盛产良马。迫于俄国之武力，受尽凌辱，俄国对之征税、征兵，后甚至“指土尔户特为己属国”，但由于“土尔户特习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罗斯城郭居，风俗既异；土尔户特重佛教，……，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故土尔户特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于是积极争取和清朝联系。顺治十二年（1655年），土尔户特遣使锡喇布鄂木布奉表入贡。之后，清政府亦遣图理琛出使土尔户特部，到康熙中，仍表贡不绝。然而土尔户特部和清朝的交往受到了策妄阿拉布坦等的作梗，使得土尔户特部无法入藏礼佛，亦无法直接进贡清中央政府。但土部在其首领阿玉奇的带领下不堪承受沙俄之压迫，决心归附清中央政府，爰借道俄罗斯入贡，“圣祖鉴其诚，使图理琛往报之”，向他们介绍中原的文化、习俗、宗教等，阿玉奇甚喜，并要图理琛代为转奏隶属俄罗斯之苦和思图归顺之意。至乾隆二十六年，土尔户特全族东迁伊犁，“赴伊犁将军前请安，备陈投顺之情”，一来是归附清中央政府，二来是逃避俄罗斯国的凌辱。至此，土尔户特人民自顺治年间的间道入贡，经过一百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全部内附，成为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何秋涛通过对土尔户特部抗击沙俄压迫的记述，热情歌颂了我国各族人民决不屈服于外力威胁的光荣传统，显示了祖国各族团结的重大威力。

（二）沙俄对我国早期的友好往来

早在清初，中俄两国边疆的人民就互相贸易，交换着各自的特产和劳动成果，康熙二十一年的晓谕中就明确地希望俄国停止军事行动，“互相贸易以安生业”，但由于沙俄政府的不听劝告而被迫宣布“绝互市”。《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康熙三十二年，“察罕汗遣使入贡，……带来货物仍令贸易”。之后，中俄贸易列下定例，“俄罗斯国准其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一支廩给，限八十日起程还国”。

当时，中俄贸易点有三处：京师互市、黑龙江互市、恰克图互市。京师互市主要是指官方的来往，最早的记载是顺治十二年。其所谓贸易乃是来朝使节所带物品，凡俄罗斯馆负责接待的贸易者皆属京师贸易，京师贸易有一定定例（详前所述，此不赘）。黑龙江互市主要是指黑龙江流域区的贸易。何氏说：“黑龙江邻俄罗斯，自康熙二十八年立碑分界后，每年派官兵巡察边境”，故“无远省之商，无难得之货”，仅有土产交易，政府也没有把它当作真正的贸易中心而派专员管理。恰克图互市区是指以恰克图为贸易中心的贸易，位于我国西北边，方圆数千里的商贾皆荟萃于此，是一个繁荣的都会。恰克图互市设立于康熙年间，起初中心在库伦，雍正五年，中国在边疆设立了卡伦，于是互市便迁到恰克图，恰克图贸易市场对于俄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大量的皮货从俄国源源不断地运到恰克图市场，售往中国，所以何氏说：“恰克图贸易于俄罗斯国计所关甚钜”。

但1852年以后，中俄贸易开始衰退，传统的恰克图

贸易大非昔比，于是俄国要另辟新的市场，选中了有基础的黑龙江市场，为了确保贸易的景气，决定用“获取黑龙江”的办法来“补偿因恰克图贸易衰落而造成的损失”。至此，中俄经济贸易带上了政治的色彩。

为了保证中俄贸易正常进行，清政府制定了有关边境贸易章程或法规。在经济贸易的同时，中俄还进行文化的交流。何秋涛记载说，康熙九年四月，“俄罗斯遣使奉表投诚，表文字不可识，字体自下而上类道家符篆，因令其来使译文以进”。为此，康熙帝，带头学习俄罗斯文，并让俄国人懂得中国文字。于是“定例八旗设俄罗斯学生，习彼国文字”，从此以后，“俄罗斯文字八旗诸生亦既童而习之矣”，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俄罗斯学产生了。俄罗斯学分二部份，清朝国子监负责管理的俄罗斯学是为俄罗斯来京读书子弟学满文而设的，由中国政府“原给廪糈，精选文学之官以教习之，岁满则归其本国，复使其他子弟代，谓之‘换班’”，而内阁理藩院之俄国罗斯学，即为八旗子弟学俄罗斯文字而设的。俄罗斯学的兴起加强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了解。在俄国方面，俄罗斯“慕我朝德化，岁时使其国秀颖子弟来都城学满汉文字，诵习经史诸书”。何秋涛认为这是“亘古以来所未有之盛举”。

文化的交流亦曾因战争暂时中断，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有所恢复。条约签订后，“俄罗斯约束其边界人等永不滋事，复申请遣人进京学习。”为了适应这一局面，在京师设立了俄罗斯馆，俄罗斯馆一方面负责接纳俄罗斯派来的学生和贸易使者，另一方面又要“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俄罗斯馆由清朝负责外交事务和宗教事务的理藩院统一管理，按照定例每